

記《新編漢文典》：

一部探究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的歷史和比較類書

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onceptual Schemes

葉正道 (Ye Zhengdao)*

本文主要介紹由挪威奧斯陸大學 (University of Oslo) 著名漢學家 Christoph Harbsmeier (何莫邪) 教授主持主編的《新編漢文典》(*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以下簡稱 TLS) 這一課題項目。《新編漢文典》是一部研究漢語言概念發展, 並與古希臘、古拉丁等世界其他文明的概念發展作對比的線上百科全書, 為目前國際漢學界研究跨度最大、研究最深入全面、合作領域最廣泛的一項有關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的系統綜合工程。下文就其重點研究的歷史階段劃分、項目的主要特徵、研究角度、研究材料、該項目的歷史、參與編纂的專家、該文典的使用對象和用途及其意義等, 逐一作分述。

一、獨特性

《新編漢文典》研究的是三千年來體現在漢語言中的概念範疇網絡及其演變歷史。它對歷史階段的劃分有它自己獨特的理性基礎, 有別於一般歷史時期的劃分。TLS 從漢語言在歷史上的發展及受外來影響的角度出發, 把研究重點放在以下五個時域: 甲骨文時期 (約公元前 115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銅器銘文時期 (約始於公元前 1150 年)、「先佛」(佛教傳入以前) 時期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 200 年)、佛教漢語口語時期 (約公元 100 年至 1000 年)、北京普通話時期 (公元 1966 至 1969 年)。這幾個歷史階段極具代表性地反映了漢語言在歷史上的變遷及其各階段的語言特徵。

二、獨創性

就總體而言, TLS 具有以下六方面的特徵:

(一) 以 8,500 多頁文本材料為依據, 探索「先佛」時期漢語的概念範疇網絡。這些文本都有逐字逐句的對照翻譯。

(二) 在語言、邏輯和哲學方面進行持續的分析, 自始至終使古漢語及其他語言之間有著嚴格的可比性。如此一來, 即便是非漢學人士就古漢語概念和詞彙提出不同之意見, 其意見亦是建立在有意義的分析和可信賴的證據之上。

(三) 對漢語言文獻進行謹慎細微的哲學反省, 希望能為哲學理論之建設和總結概念範疇網絡之一般規律及特點, 拓寬實踐經驗之基礎。

(四)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 以擴大來源於不同思想文化的文獻材料基礎, 能幫助我們就概念整體間是否存在差別, 作出更明確、更具說服力的論斷。而這些文獻材料應當經過字面翻譯和深入的分析。

(五) 對於要理解「他者」, 我們必須認定「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看法。TLS 認為其雖有可取之處, 但並不妨礙它以批評的眼光全面來探索深層的概念差異。

(六) 通過英語對漢語詞彙之間重覆出現的規律語義關係 (尤其是區別性語義特徵) 作詳細地描述, 為古漢語的翻譯制定精確的翻譯標準。

這些主要特徵其實也是 TLS 的理性基礎。在 TLS

* 作者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之前還未曾有系統嘗試研究三千年來漢語言的概念。TLS在這方面不僅是首創，更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其意義下文將另作深入的討論，但從下列幾個「第一」中已可窺見一斑。這些「第一」也可視為 TLS 的具體特徵：1. TLS 是第一部漢外古漢語同義詞詞典，詞典的重點放在細微的語義差別；2. 第一部漢語互動詞典；3. 第一部以種屬關係和部分總體關係，有系統地將漢語詞彙加以組織的詞典，從而展示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的整體面貌，勾勒出漢語思維空間的形態結構變化；4. 第一部系統地記錄詞彙間相互關係（如反義詞、對義詞等）的詞典；把概念空間定義為關係空間；5. 第一部融句法分析為一體的詞典，收入 600 多種不同的句型用法，使我們可以有系統地研究一些基本語言現象，例如抽象名詞的自然發展史等；6. 第一部以語料為基礎，記錄文獻中修辭法的詞典，使我們能研究一些重要的思維方式，如「反諷」的歷史等。

在 TLS 中，所有分析範疇和分析步驟都具有很強的靈活性，能根據新掌握的材料和新的分析結果不斷地修正和改進。從以上這些特徵中可以看出，TLS 既從整體入手來研究漢語言概念的發展，又著眼於細微處（例如同義詞辨析、詞與詞之間的反義、對義、修飾關係等），把概念範疇之間存在的微妙關係揭示出來；既有線性的歷史比較，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聯繫起來，又有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橫向比較，幾條研究主線縱橫交叉，把古今中外連接了起來。

三、全面深入性

TLS 從多個角度對漢語言概念範疇之間存在的關係，進行全方位的透視和研究。

（一）訓詁視角

TLS 認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研究中國社會和文化本身離不開研究所依賴的漢語言材料，這也就是說我們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細微深入的理解，最終與我們對漢語口語及書面材料中細微的語義差別的理解不相左右。（考古本身或許能解釋中國文化，但 TLS 研究的對象不是具體的實物，而是漢語概念範疇之間存在的關係。）它旨在以歷史訓詁的精神來探索這些細微的語義差別，因此，它首先必須是以訓詁為其基本研究定向。從漢語自身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TLS 把其所建構的現

代概念範疇網絡，和現代漢語概念的發展關聯了起來，置兩者於動態的歷史關係中。同時，它又把這兩者置於一個更廣的比較空間之中，拿它跟其他文化傳統中的古、現代的觀念及認知網絡，作系統與動態的分析比較。

（二）社會歷史視角

視角之二為社會歷史的角度。從一開始，TLS 就受到以社會歷史學家 R. Koselleck 為代表的概念歷史傳統的啟發。代表這一傳統的著作有八卷本的《基本歷史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c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十二卷本的《哲學歷史辭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Schwabe, 1971）、六卷本的《修辭歷史辭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Rhetorik*, Tübingen: M. Niemeyer, 1992-），以及已出版四十多期的《概念歷史檔案》（*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955-）（原著皆為德語；必須指出的是，它們都帶有歐洲中心的思想傾向）。TLS 把概念範疇形成的歷史和概念範疇網絡的發展歷史，看作為部分創造及定義不斷演變的思想和社會空間。這一看法體現在 R. Koselleck 的經典之作《批評和危機》（*Kritik und Krise*, 1959）一書中（其英語翻譯版由麻省理工學院 1988 出版）（*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MIT, 1988）。TLS 的目的在為中國研究這樣的觀念發展，提供更廣的訓詁學及雙語基礎。它把各時域的研究重點，放在該時期廣泛使用的常用詞彙上，著重關鍵詞的研究，因為就是這些常用的詞彙，三千年來對形成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普遍習慣，起了重要的作用。（參閱 R. Williams 的《關鍵詞》一書（*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5））。

（三）概念民族誌視角

民族誌的視角要求 TLS 對上文所提及的關鍵詞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語義描述。在這方面，TLS 借鑒了一批優秀的同義詞詞典的分析成果，例如 L. Doederlein 的《拉丁語同義詞和詞源》（*Lateinische Synonyme und Etymologien*, 6 Bde., Leipzig: Vogel, 1826-1836, 德語）和 J. H. H. Schmidt 三卷本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同義詞詞典》（*Handbuch der lateinischen und griechischen Synonymik*, Leipzig: Teubner, 1889, 德語）。同時，TLS

希望像莫斯科語義學派的 Juri Apresjan 和 Igor A. Mel'cuk 那樣能對關鍵詞的涵義進行深入的語義分析，做到語法描述明晰，訓釋詳盡。Juri Apresjan 著有《俄語同義詞解釋詞典》（*Novyj Ob'jasnitel'nyj Slovar' Sinonimov Russkogo Jazyka*, Moscow: Nauka, 1997 俄語）和《系統詞典學》（*Systematic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英譯本）；Igor A. Mel'cuk 和 Aleksander K. Zholkovsky 合著有《現代俄語搭配解釋詞典》（*Tolkovo-Kombinatornyj Slovar' Soveremennogo Russkogo Jazyka*, Vienna: Slawischer Almanach, 1984 俄語）。此外，TLS 還得益於語義學家 Anna Wierzbicka 在概念民族誌方面所作的對比分析和描述，其代表作有《語義，文化和認知》（*Semantics, culture, and cognition: universal human concepts in culture-specific configur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英語），《從文化關鍵詞理解其文化》（*Understanding cultures through their key 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英語），《情感、情緒的跨語言和文化研究》（*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英語）。

（四）認知視角

TLS 希望在探索同義詞構組規律及其內部差異的同時，能系統地描述和分析反映在漢語言中或隱或顯的概念範疇，及其之間的關係。在 TLS 看來，每一組同義詞的內部成員，都是構成此語義場概念範疇的外部標誌；而用來區別每一組同義詞內部成員的區別語義特徵，則是對這一組概念範疇所具有之特徵的歸納總結，也就是我們在選用同義詞時決定使用某一詞語（而非另一詞語）的內在理由和標準。TLS 也試圖區分每一時域內，常用的核心概念和非常用的專科術語。每個詞條都標明其常用頻度（共分五級）。

（五）考古視角

TLS 認為要使我們更有意義地研究一些具有重要文化傳統，並在歷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概念範疇網絡，我們必須有系統地關注由考古學提供的有關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方面的證據。基於這個認識，TLS 竭盡全力把可以用圖表來說明問題的東西，都配上考古插圖。這些圖表以「先佛」時代的出土文物為主。TLS 希望把有關實物的討論跟一般的考古文獻結合起來。若相關詞彙可輔

以確定的考古文物來圖示的話，也希望以圖表來說明一些諸如「宴」等社交活動。TLS 所關注的出土文物其古代專名都已有確說，並已收入 TLS 中。

（六）跨文化視角

TLS 假定所有認知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無對等可譯性，甚至無可比性。這就更突出了訓詁研究的必要及其重要價值。TLS 從研究同義詞組入手，希望大家能對漢語認知文化的具體特徵有所瞭解和認識，這樣的認識也是建立在跟其他古老文明（希臘、羅馬、西伯萊等）語言作比較的基礎之上。TLS 也會把漢語跟俄語作比較，因為俄語在同義詞研究方面做得最多、最細。TLS 認為用於同義詞跨文化比較分析的共同衡量尺度，必須是具有最大普世性的原語言，最好是有以下兩方面的經驗基礎：第一，已在同義詞語義研究上有比較深入的一些古典語言並和其他語言有較廣泛的訓詁經驗；第二，在邏輯、語法、語義分析上，得到系統應用。

（七）本土視角

TLS 堅持從漢語的角度出發來研究漢語的材料，立足於漢語本位，而不是機械地套用外來的概念範疇。該項目的工作語言以漢語為主。迄今收集和整理並用於系統分析漢語同義詞方面的書籍和文章，已達 700 種之多，它們代表著豐富的中華學術傳統和學術淵源。代表性詞典有：《古漢語同義詞詞典》（1998），《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黃金貴，1995），《新編古今漢語詞典》（袁暉，1994），《同義詞和反義詞詳釋》（陳炳昭，1996），《現代漢語分類詞典》（董大年，1998），《現代漢語常用詞辨析詞典》（姜光輝，1998）等。

（八）歷時的視角

TLS 把漫長的漢語概念發展歷史和現代漢語的發展緊密地聯繫起來，兩者呈現出動態的歷史關係：TLS 先把焦點放在古漢語，然後把它和現代漢語聯繫起來，以完全一致的標準貫穿兩者的分析。現代漢語使用大量的成語，它們反映了古漢語的詞彙和語法，早期口語的因素尤為明顯。TLS 會把這些語言的連續現象記錄下來，反映漢語過去在現代中的體現。現代漢語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構詞現象，是用古漢語句法原則來解釋，一些語素的釋義過程會指明它在 TLS 中相關的古漢語詞條，以便上溯其源。現代漢語核心詞彙的形成受到佛教、蒙古和近期歐化現象的影響，TLS 也會把這些影響記錄下來，

並把專科詞彙和一般詞彙區別分開，把重點放在常用的核心詞彙以及主要術語的歷史和對照分析上。

TLS 這些獨特而全面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重分析比較的特點，賦予了它重要的學術價值，早已超越了一般以收集材料和羅列知識為主的百科全書。

四、國際性

參與 TLS 編纂的工作人員，均是當今在漢學各領域卓有建樹的中外學者。由北京大學蔣紹愚教授擔任副主編，具體參與各領域合作編纂的則有北京大學的陸儉明教授（現代漢語）和朱慶之教授（佛教漢語），上海師範大學的潘悟雲教授（音韻），浙江大學的黃金貴教授（物質文化）；比利時魯汶大學（Leuven University）的 Carine Defoort 教授（「先佛」時期的哲學）；德國勃洪大學（University of Bochum）的 Wolfgang Behr 教授（音韻），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 Ulrich Lau 教授（「先佛」時期的法律史），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的 Ulrich Unger 教授（銅器銘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 Francoise Bottero 教授（漢字分析）和 Karine Chemla 教授（數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的 Ken-Ichi Takashima 教授（甲骨文卜辭）；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 Michael Puett 教授（思想史），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 David Keightley 教授（商代歷史）、Michael Nylan 教授（漢圖表）和 Stephen West 教授（元雜劇），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 William Baxter 教授（音韻），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 Martin Kern 教授（「先佛」詩歌）和 Andrew Plaks 教授（明清小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 William Boltz 教授（詞類）；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的 Christoph Anderl 教授（佛教漢語口語）；意大利羅馬智慧大學（La Sapienza University）的 Federico Masini 教授（外來語），威尼斯大學（University of Venice）的 Alfredo Cadonna 教授（佛教漢語口語）；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 Jessica Rawson 教授（考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TLS 和捷克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的 Jakub Ma-

rsalek 教授（物質文化）、David Sehnal 教授（現代漢語）和 Olga Lomova 教授（詩詞）長期而細緻的合作。

此外，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郭錫良教授、馬真教授、李零教授、邵永海教授及胡敕瑞教授，人民大學的胡明揚教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何樂士教授和龐樸教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陳鼓應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的高守綱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 Edward Shaughnessy 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教授，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 David Knechtges 教授，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 Wiebke Denecke 教授；德國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的 Michael Friedrich 教授，圖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的 Ulrich Vogel 教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 Redouane Djamouri 教授，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的 Tone Sandøy 教授、YU Jing 教授、Johan Vilny 教授、Christian Linder 教授、Toril Waage 教授，塔森大學（University of Taasen）的 Ingeborg Harbsmeier 教授等都為此項目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作為一部龐大、綜合、系統的電子文庫，TLS 對技術上的要求之高不言而喻，丹麥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 Jens Østergaard Petersen 先生以其獨創的文件製作數據庫和網頁製作，為 TLS 解決所有技術上的難題，貢獻良多。

五、廣泛性

文獻材料是 TLS 研究概念範疇網絡的基礎。TLS 研究的材料可謂既廣泛又豐富，因時而異。古漢語以前以甲骨文卜辭和銘文為主。先佛時期以銘文和文言典籍為主。因為中古時期研究的一些重要材料是從梵文和其他一些佛教口語著述中翻譯過來的，故 TLS 認為必須把這一時期佛教對漢語語法和詞彙的影響也考慮進去。而到了現代漢語時期，則必須把語法和詞彙歐化現象考慮進去，並充分利用錄音和影視材料。這裡值得一提的是，TLS 把現代漢語的研究定在 66-69 年這個時段，與它的研究材料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因為這些視聽材料主要研究的對象是由 Yang Yunling 女士（滿族，30 年代在北京茶館長大，為說書人，擅長武藝）於 66-69

年所錄的，長達 1,500 小時的北京普通話錄音詞典，由布拉格漢語音系學派著名的 Oldrich Svarny 教授錄製，涵蓋了陸志偉《現代漢語拼音詞彙》（1963）和 Svarny 教授《北京話單音詞彙》（1956）中所有的詞彙，目前正在奧斯陸製作成 2,000 小時的電子版本。當然視聽材料不僅限於此，它們還包括侯寶林 6、70 年代錄製的相聲，以及後來由操北京話的演員演出的電影和寫實電視劇。這些視聽材料中的語言使用情況，將拿來跟同一時期標準的詞典用法及語法作比較。

六、實用性

TLS 的寶貴價值不僅展現在其學術意義上，還展現在其實用性上。它是一部網絡化的動態百科全書，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無論用戶懂不懂漢語，是不是從事漢語研究，只要是想查閱古代主要的傳世文獻都可以使用 TLS，並且可以迅速、快捷地獲得大量、全面的相關信息。比如說，用戶可以通過譯文和同義詞辨析詞典直接接觸到漢語原文。TLS 為 30 多部古漢語典籍提供了逐字逐句的對照翻譯，每一頁都可直接「進入」詞典。同時，所有在這些典籍中出現的漢字，都可以和其在 TLS 其他地方出現的意義加以對照。

TLS 提供便捷的檢索功能，用戶能在同一時間獲得大量的相關信息。毋庸置疑，作為互動式的分析庫，TLS 亦是寶貴的古漢語教學工具。古漢語初學者和高級班的學員（無論是外國學生還是中國學生）在閱讀典籍時，能在同一網頁上瞭解到詞義之間細微的語義差別、句法結構、所用的修辭法，以及供用戶參考和評價的一般翻譯。TLS 還設有空白一欄供用戶自己寫評注。

作為第一部漢外古漢語詞典，TLS 更為我們瞭解其他古現代文明提供了一個窗口。

七、TLS 的成長史

《新編漢文典》從誕生到它現有的規模已走過了十五載。最初它只是何教授自己使用的電子資料庫，收集、整理、校訂並輸入了古漢語文獻。何教授認為如果沒有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典」以及後來香港中文大學的「漢達古文獻資料庫」（CHANT），也就沒有 TLS 最初的起步。1993 年起何教授開始製作有逐

字逐句翻譯的電子版本，作為向最優秀的漢學家兼翻譯家學習的一個重要途徑，這些翻譯版本成了他自己的知識庫。期間 TLS 受到奧斯陸大學關鍵性的撥款支持。1994 何教授開始匯編古漢語同義詞綜合詞典，後製成綜合的格式化的文件供學生使用，並成為個人使用的分析庫。到 1997 年，哥本哈根的 Jens Østergaard Petersen 建議並開始設計開發電子製檔數據庫，以應付 TLS 在技術上日益擴大的要求。1998 年起，TLS 開始成為北京大學、奧斯陸大學以及其他一些大學之間合作的跨國際項目。1999 年至 2000 年，TLS 獲奧斯陸大學撥款，供 Petersen 在奧斯陸大學專門從事 TLS 的技術工作。2001 年起 TLS 獲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撥款，支持 TLS 的部分材料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文檔中心以電子版形式出版，全部款項用於編程和網頁製作。

從資料庫到知識庫再到分析庫，TLS 已歷經三代；從最初的私人資料庫到大學間跨國際的合作項目，TLS 已走出私人書齋，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一處寶藏。

八、開放性

網上出版的靈活性更使 TLS 成為一個不斷向前發展，開放性的當代類書。何教授認為用戶們不應把 TLS 看成是權威性的工具書，而應把它看成是一個「電子建設站」——一個便捷的平臺，供學者們持續地討論有關漢語言三千年來的發展情況。TLS 對漢語言的文法、概念、修辭所作的分析並不是無可反駁的，它們都只是假說，會根據新材料的分析結果和積累的新證據而不斷地加以調整。總之，TLS 將努力保持其探索性和試驗性的特點。

TLS 還希望能建立一個綜合而便捷的「訓詁基礎結構」，使我們可以更敏感、更具分析性地來描述三千年來漢語言在詞彙、語法、修辭方面的歷史發展狀況。這一「結構」的建設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TLS 還保留了當初何教授研究筆記的痕跡。如前文所說，剛開始時 TLS 只不過是何教授自己的一個半系統化的分析庫，記錄了他研究分析漢語歷史發展的筆記。這些早期的注釋不僅使我們看到了 TLS 最初的歷史，也給電子 TLS 增添了很濃的「人性」色彩。

九、突破性

到目前為止，TLS 收入詞條約 27,000 條，例句 60,000 多句，句類 600 多種，同義詞構組 2,086 組（並且其內部種屬或部分整體屬關係都已得到確定，1,078 組已經過語義對比分析），已經翻譯並有詳細註解的甲骨 800 多片，已有德語翻譯和註解的銅器銘文達 1,560 條，先佛時代的 30 多部典籍都有逐字逐句的對照翻譯，經過翻譯的段落 85,000 個之多。此外，它還包括了高本漢（B.Karlgren）的《古漢語文典》和蒲立本（E.G. Pulleyblank）的《發音詞典》（1993）等多部詞典。從音韻角度來看，它收入了 7 世紀的《經典釋文》，1008 年的《廣韻》以及潘悟雲教授對古代音韻的構擬。從漢字字源來看，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亦對高本漢未能分析精當的漢字字體重新進行了分析。TLS 是迄今為止收入漢字字型最多的一部詞典，有 85,000 個漢字字形及 300,000 個漢字字形變體。

TLS 目前所包括的詞典中還有一部非常獨特的數學用語漢法詞典，為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 Karine Chemla 編著。該詞典對 300 多個數學用語進行了詳細的考釋。另外，Ulrich Unger 整理編寫的 900 多篇先秦人物的生平介紹，包括了這些人物的出處及其相關研究資料，不僅有助於讀者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材料，還為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索引。

十、結語

TLS 集學術價值和實用性為一體，非一類書所能企及，是探究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方面的創舉，給漢語言及文化研究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帶來了重要的突破和啟示，尤其體現在方法論上。筆者以為 TLS 至少在以下七個方面，對漢語言和文化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

首先，從漢語言研究的角度來看，TLS 是迄今為止對漢語整個歷史發展最全面、最系統的整理。長期以來漢語研究似乎形成了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研究各自為營的局面，歷時的研究，亦多限於個別語言現象，系統的關照較少。TLS 把古代漢語置於漢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將現代漢語聯繫起來，從而能上溯下聯，展現了一幅漢語言概念發展的全景圖。

第二，字典和詞典的編纂，向來為中華文化之優秀傳統，也是我們瞭解先人概念世界最直接的途徑。但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同義詞辨析為古漢語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尚缺乏整體的梳理和系統的釋義，而恰恰是同義詞之間的細微差別，最能反映出概念範疇之間存在的微妙關係。TLS 在扎根於漢語傳統，發掘和汲取傳統研究之精華的同時，又吸收了國外語言學界在這方面的優秀成果，並以其持久的實踐工作，提高了釋義辨析的質量和層次，將為這方面的研究起推動作用。

第三，修辭與思維的關係極為密切，但目前還鮮有把語法、語義和修辭結合起來，從而全面研究漢語及其概念範疇網絡的課題。而把這三方面結合起來又至關重要，因為不僅能揭示漢語言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更能瞭解人類思維的一些共性特徵。

第四，從認知科學來講，TLS 無疑給這門學科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第五，TLS 始終以漢語為出發點可為學人所啟發。時下從認知角度來研究漢語，多是以漢語來印證國外各種理論，少有從漢語本身出發的哲學式反省，因此也就難以窺探到漢語概念世界的真實面貌及其本質特點。TLS 在這方面樹立了重要的榜樣。

第六，TLS 在繼承和發展漢語言研究的歷史傳統時，又賦予漢語一個更廣闊的跨文化視角，把漢語置於世界文化之林，加以比較。TLS 能融匯古今中外於一典，與何教授本人在古漢語、西方古典語言、現代東西方語言以及哲學和科學方面的修養及造詣是分不開的，這可在何教授所著《語言和邏輯》一書中窺見一斑（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 英語，為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冊上卷）（*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Vol. 7,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再有，TLS 亦為古漢語的信息化處理起了推動作用。

TLS 內容之深、廣、博也不是一篇文章能「盡其所能」。本文只是從最宏觀的角度作一個介紹，尚未涉及 TLS 中一些主要的概念及其在微觀層面上的具體操作方法和步驟。

總之，TLS 把中華文化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無論是從人文還是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TSL 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仍在不斷擴大、發展、建設和完善中。我們期待將來各領域的中外學者都能享用並從中獲益。